

偉大而平凡的 中國女性 — 懷念王師母夏蔚霞女士

田小琳老師

曾經聽人議論，說中國有句俗話，說的是「大丈夫能伸能屈」，其實中國的婦女才真正是能伸能屈，比起大丈夫來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這話說得有道理，看我們身旁祖母輩、母親輩的女性，大都經歷過戰亂，遭受過厄運，可其中不少女性和大丈夫一樣，能伸能屈。

我們的王師母也和大丈夫一樣，能伸能屈，能屈能伸。

王師母是偉大的女性。她1935年和王力先生結為夫妻，與王先生一起，共同奮鬥半個世紀。王力先生在他八十歲那年寫下的遺囑裏說，「我的一生，是奮鬥的一生。」他對子女們說：「人活着是為了什麼？並不是為了穿衣吃飯。穿衣吃飯是為了生活，而生活本身還有崇高的目的，那就是為國家、為民族做一些有益的事情。要把為人類造福(包括為國家民族文化作出貢獻)當做最大的樂事，最大的幸福。」王先生和王師母正是以這樣崇高的信念奮鬥了一生。

王力先生龍蟲並雕，著作等身，成就為現代中國語言學家的泰斗，為中國語言學的建立和拓展，為中國語言學隊伍的建設和發展，立下了汗馬功勞；在高等教育界，是科研和教學相結合的典範，真正是為國家民族文化作出了巨大貢獻。而王先生能有這樣的成就，王師母功不可沒。因而王師母是偉大的。

王師母是蘇州人，出身於書香之家，在景海女師畢業後就留校當圖書管理員，有語言天賦，英語基礎很好，還彈得一手好鋼琴。她仰慕王先生的人品才學，對王先生熱衷的語言學也很有興趣。他們的結合，使王先生在漫長的人生道路上有了知音。

婚後不久，正值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，王先生和王師母隨同清華大學的南遷開始了戰亂時期的生活。甫在北平上火車往天津，就受到了日本鬼子的盤問和翻查。後經青島、鄭州、武漢，輾轉奔波到了湖南長沙。清華、北大、南開三校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，南京淪陷後，又遷往昆明，成為「西南聯合大學」。王先生夫婦在抗戰時期，主要在昆明度過。期間，王先生曾回廣西桂林半年，任職廣西大學；又曾去越南河內近一年，去遠東學院進修。王先生在此期間，完成《中國現代語法》、《中國語法理論》兩部在語法史上有深遠影響的專著，奠定了他在中國語言學界的地位。王先生在事業上的輝煌成就，卻是在清苦的生活中取得的。王先生在一篇《領薪水》的小品文中說道：“大約領得薪水的頭十天，生活還可以將就過得去，其餘二十天的苦況，連自己也不知怎樣‘挨’了過去的。”而王師母一直陪伴在側，在戰亂環境裏臨危不懼，臨危不亂，安

排家庭生活，使王先生能安心於教學和研究。她因生活的拮据要給人繡綿旗，織毛衣，幫補家用，安貧樂道，毫無怨言。王先生在回憶這段日子時，有兩句詩說“七省奔波逃獵狃，一燈如豆伴淒涼。”（1980年王先生詩《贈內》）在那種日子裏，顯示了師母的崇高人品，顯示出了師母的偉大。

除了八年抗戰的戰亂，還有“文革”十年的內亂。王師母又一如既往地臨危不懼，臨危不亂，幫助王先生度過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。她怕王先生挨打，找出兩瓶白藥讓王先生藏在身上，她說：“若挨了打，就用它來治傷。你要堅強，要挺得住，好人總歸是好人，自己不做虧心事，用不着怕。”王師母制止不了打人，卻想到了白藥，那機智裏透着對王先生的無微不至的體貼關懷。王先生是愛國的知識份子，抗戰時期到處顛沛流離，再困難也難不倒他，他以自己為國家民族文化作貢獻盡着自己的力量。但是文革中無休止地批鬥、懷疑、栽贓卻使他的信心動搖了，知識份子最怕的是屈辱，有一天王先生傷心地對師母說：“我管不了孩子了！”師母從這句話裏聽到了王先生的話外音，她勸王先生要挺住，要堅強，她對王先生說：“你的問題真鑄成了冤案，所有權利都剝奪殆盡，就憑我一個人的工資，我們也要頂着，苦苦地一塊活下去。”當王先生不再享有國家一級教授的榮銜而失去自由時，當燕南園60號被別人“佔據”時，師母不怕苦苦地活下去。這就是榮辱不驚的師母，這就是能伸能屈的師母！

王師母是偉大的女性，王師母又是平凡的女性。

王師母是平凡的女性，她和無數中國的女性一樣，相夫教子，對所有的子女體現着她無私的母愛。王先生去世以後，我和師母通信頻繁，師母在每封信裏敘着家常。我和王力先生的子女緝志、緝惠、緝憲都相熟，和緝思、緝慈也見過面，吃過飯，通過電話。在大學時，我們中文系的女聲小合唱是數學系的緝志拉手風琴伴奏的。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時，緝惠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工作，都在一個樓裏辦公，王先生讓我要辦什麼事，信件都托緝惠帶來。到香港後，我在香港大學兼課，緝惠也在港大地理系，那時常有往來。師母知道我和他們都熟識，所以在信裏常常拉家常。師母對他們兄弟姐妹五人以及他們的孩子，個個都牽腸掛肚。

最令人感動的是她對緝惠的愛。緝惠是師母的愛女，每逢週末都從城裏回北大探望母親，她教子有方，兩個孩子一兒一女都是拔尖的優秀學生。但不幸的是，她於1991年病逝。師母在信中詳告我緝惠仙逝的情境。她說，“緝惠在最後的幾天裏，我去探病，希望她和我一樣做氣功。她說，她不會。但在臨終前的一個星期天，她叫她的女兒一汀蘭，放《少女的祈禱》錄音給她聽，從那以後，她再也沒有睜開眼，如睡熟的樣子，不叫疼……，醫生說，這是最好的離去，醫學上叫‘昏睡’。她的遺容和她平時睡着一樣，一點沒有痛苦的样子，我心中稍安，但我畢竟失去了

一個待我最好的女兒，我時刻都在想念中。”字裏行間，充滿着母親對女兒深厚的愛。

王師母在婚前就知道，王先生已有三個子女，她對這三個子女視如親生子女，這是很不容易的事。王先生曾對這三個子女說：“你們要尊敬你們的後母。你們的後母數十年來照顧我的生活無微不至，對你們也當親子女看待。這樣的賢良的後母，世間少有。”

師母不僅對子女關心備至，對我們這些王先生的學生也都關愛有加。王先生在世時，我沒和師母通過信，現在保存的都是王先生的信；王先生逝世後，師母給我寫過很多信，長的有三頁紙，密密麻麻秀麗的字。師母承擔起了王先生愛護學生的責任。信中有對我的鼓勵，看了我的文章，對香港語文政策發表她的看法，希望我在香港好好工作；知道我轉往嶺南大學任教，特表示祝賀，並告訴我北京的嶺南校友會常邀請她參加活動。王先生的書再版，《王力傳》出版，師母都不忘寄給我，或托人帶給我。和師母保持密切聯絡的，何止我一個？在王先生去世後的二十年裏，王師母把王力精神繼續發揚光大。我們受過王先生教導的一群學生，也對師母像對王先生一樣尊敬和熱愛。王師母也走了，但中國傳統的師生關係帶給我們的溫暖，卻永遠留在心中，這是我們所擁有的精神財富。

2003年10月的一天，師母離世前的一周，我和王均先生、程祥徽夫婦同車到北大校醫院住院部去探望師母，長子緝志夫婦伺候在側，不久林燾先生也到了。緝志對我說，北醫三院的醫生說，師母隨時都可能出現危狀。可眼前的師母，雖然瘦削了很多，但談興很高，兩眼炯炯有神。她不忘禮貌地問候林先生和王先生的身體，又對我們說，她快走了，她沒什麼遺憾，孩子們個個都成材了。因為她聽覺失靈，我在紙上寫給她說，等她好了還要到她家吃飯，要她請我們吃烤鴨。但這些話已經騙不了師母了，師母笑笑說，沒有這個可能了。我們都知道，這大概就是見師母的最後一面了。

王師母隨王先生安息在北京萬安公墓了，那墓碑上早在王先生安葬時，就有他們二人恩愛的合影，只是墓碑上原來紅色的“夏蔚霞”三個字，現在也變成了黑色的了。王師母在信中對我說過的，想到天國和王先生、緝惠見面的話成真了。讓人不勝唏噓。

我們會永遠懷念偉大而平凡的王先生，永遠懷念偉大而平凡的王師母。